

南京艺术学院

冯健亲优秀学位论文奖学金  
获奖论文集（学士）

2013届

南京艺术学院

# 冯健亲优秀学位论文奖学金 2013 届获奖论文集（学士）

主 编：邹建平

副主编：何晓佑

南京艺术学院

# 目录

# CONTENTS

## [ 一等奖 ]

|                                           |     |     |
|-------------------------------------------|-----|-----|
| 南朝齐梁帝陵地表遗迹研究                              | 王贵阳 | 001 |
|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补笔修正考                           | 李梦媛 | 024 |
| 中国钢琴奏鸣曲的诞生——关于马思聪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           | 杜佳骏 | 045 |
| 见微知著——从《长物志》中解读江南私家园林第宅的陈设状况              | 许欣悦 | 053 |
| 论从席地起居到垂足而坐对中国古代设计的影响                     | 张 荃 | 068 |
| 论电影中的青春期少女意识——以电影《鱼缸》、《成长教育》、《国中女生》为例     | 贾 黎 | 086 |
| 预告片也要学会“说话”——浅析电影预告片《金陵十三钗》国内版和北美版叙事性差异   | 卞 波 | 092 |
| 自我关注的盛宴——对女性摄影自拍的研究                       | 王 瑶 | 099 |
| 当代“中国古典舞”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肖 璐 | 104 |
| 当代中西方美术馆会员制度运作方式与功能的比较研究——以 MoMA 和今日美术馆为例 | 王智洋 | 112 |

## [ 二等奖 ]

|                              |             |     |
|------------------------------|-------------|-----|
| 明万历刊本《酣酣斋酒牌》研究——从酒牌功能角度      | 彭 菁         | 121 |
| 翳然林木，自有濠濮间想——中国绘画中“渔”的象征意义   | 刘 珊         | 152 |
| 浅析皮亚佐拉弦乐四重奏《Four, for Tango》 | 傅殿艺         | 163 |
| 《云锦织造》壁画创作                   | 周艳玲、陈晓凡、王永勤 | 172 |
| 新版《红楼梦》人物造型设计的批评与研究          | 孟 璐         | 173 |
| 校园驿站建造 ——生态技术分析              | 马楠、袁郡梓、王东东  | 185 |

|                            |             |     |
|----------------------------|-------------|-----|
| 石汉瑞平面设计作品的后殖民色彩研究          | 王亚翠         | 186 |
| 颜——关于色彩的实验影像               | 李天雨         | 193 |
| 《重生》参数化设计的找形与生成            | 孔祥天娇、史玛、张楚滢 | 193 |
| 浅谈导表演中的“匠意”与“程式”           | 王成荫         | 194 |
| 浅析实体游戏《背包客》的用户体验设计         | 金 霄         | 205 |
| 论三角钢琴发声原理和拾音方法             | 田 牧         | 209 |
| 咫尺之间可见天涯——从春晚舞台分析舞台空间艺术的运用 | 余俊媛         | 215 |
| 浅析明清时期的舞蹈教育                | 崔妍杰         | 222 |
| “京韵传承”——王建民古筝独奏曲《戏韵》分析     | 周星微         | 231 |
| 1978年以来中国内地流行歌曲与社会思潮的互动性研究 | 李思露         | 241 |
| 北宋吕大临《考古图》的版本研究            | 范 楨         | 252 |
| 徐州地区柳琴戏生存状态的调查与思考          | 董克伟         | 263 |
| 扬州苏唱街及丁家湾街区文物调查分析          | 孙 青         | 275 |
| 针对盲人阅读的交互设计分析              | 殷天玉         | 283 |

## [ 三等奖 ]

|                                         |                |     |
|-----------------------------------------|----------------|-----|
| 从钱坫篆书看乾嘉时期玉箸篆的继承与复兴                     | 孙 乐            | 287 |
| 李流芳绘画思想研究                               | 张 媛            | 296 |
| 波斯细密画阐释方式研究                             | 陈瑾充            | 306 |
| 克孜尔石窟中乾闥婆形象                             | 王 芊            | 318 |
| Hans Zimmer《功夫熊猫2·孔雀的故事》创作技法探析          | 赵昕政            | 319 |
| 左手作韵在潮州传统筝曲中的体现——以《寒鸦戏水》为例              | 谭艳雯            | 328 |
| 如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合理运用奥尔夫教学法——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校为例 | 李贞慧            | 333 |
| 从江南丝竹音乐看扬琴演奏艺术的传统风格                     | 曾珠亚岚           | 341 |
| 诗意化的校园——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筑审美解读                  | 吴丹秋            | 347 |
| 悬流·预知——鼓楼绿地广场景观设计                       | 苏晓梦、奚嘉逸、刘昕、于晶晶 | 357 |
| 首饰生命体系列                                 | 于 斌            | 357 |
| 线—发线—线的情绪                               | 刘元元、张成平        | 358 |
| 符 号                                     | 陈佳晰、卞昊冉        | 358 |
| “器皿”——创作报告                              | 徐一恺            | 358 |
| 3L系列儿童家具设计                              | 吴 芳            | 358 |

|                                   |     |     |
|-----------------------------------|-----|-----|
| 浅谈舞台动作的组织                         | 姜禹西 | 359 |
| 浅析新闻访谈类主持人与嘉宾的互动——以《高端访问》为例       | 张鹤睿 | 366 |
| 以“zealer 中国”为例分析视频数码测评的发展         | 张鸿锴 | 371 |
| 基于 3G 时代的车载移动媒体运营策略探析             | 曹 蔚 | 375 |
| 从弹幕视频网站看新媒体传播的交互性                 | 苏蔚平 | 384 |
| 二维码在电视媒体中的应用                      | 李 晟 | 389 |
| 浅析新世纪军旅剧中的人物形象创新——以《我是特种兵》为例      | 景 艳 | 392 |
| 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原始舞蹈探析                | 徐筱珺 | 396 |
| 论闺阁画家周淑禧的绘画艺术                     | 秦逸晗 | 401 |
| 南京诸子艺术馆受众研究                       | 宋 建 | 409 |
| 艺术品拍卖的信息化管理——拍卖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与开发       | 方 媛 | 417 |
| 用设计阐述中国式房车与移动生活——德兴众悦（御风）房车Ⅱ型改造设计 | 顾海啸 | 425 |
| 新文人家居产品设计研究                       | 何 方 | 430 |
| 律动奥运，圆梦中国——国家体育馆（鸟巢）改建之博物馆概念设计    | 朱莉娅 | 435 |
| 浅谈新兴社交媒体在企业经营中的应用                 | 吴 迪 | 443 |

# 南朝齐梁帝陵地表遗迹研究

作者：王贵阳

学号：B090103040

毕业专业：美术理论

指导老师：杨娜

【内容提要】陵墓的地表建筑、石刻等是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布置情况是当时丧葬观念的体现。本文旨在以南朝齐梁帝陵为切入点，研究当时帝陵的丧葬情况以及其背后反映的观念。

文章的第一部分是确定南朝帝陵的墓主与年代。然后将现在丹阳地区的南朝齐梁帝陵的地表遗迹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第二部分，文章试图通过现在对帝陵地表遗迹的梳理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复原出齐梁帝陵的陵园、陵区以及具体的地上与地下情况。第三部分是建立在之前对地表遗迹的复原基础之上。通过对地上、地下墓葬的分析，来看当时的丧葬观念。从而将美术史的研究上升到文化史的角度。

南朝齐梁时期的帝陵的营建有着严格的规制。在帝陵的选址上，乡土观念和风水信仰影响重大。而另一方面，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佛教更多的介入到丧葬中来。这不仅反映在帝陵的墓葬装饰中，甚至很多佛教仪式与丧葬结合，成为南朝齐梁时期葬仪葬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南朝齐梁；帝陵地表遗迹；复原；丧葬观念

## 前言：南朝石刻的学术史整理与反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它上接秦汉下启隋唐。这一时期相对与北朝，南朝局面更为安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美术史上众人所熟知的张僧繇、陆探微、戴逵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南朝陵墓石刻作为地表遗迹历经风雨，成为后世历代文人骚客凭吊的对象。早在宋代，曾极就写过《石麒麟》一诗。清代文豪袁枚也写过《梁武帝疑陵》。

古来万事风轮走，除出空虚无不朽。忽逢拦路两麒麟，欲说前朝尚张口。  
一麟腹陷泥沙深，一麟将蹲山角阴。牙须剥落麟爪尽，风雨千年石不禁。

.....

呜呼！君不见，南朝二十餘陵尽建康，冬青无树烟茫茫。<sup>1</sup>

除了文人的诗词，传统史籍如《南史》、《南齐书》等对南朝陵墓石刻也多有记载：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鬥隧中，其一被傷奔走。青蟲食陵樹葉略盡。癸丑，交州刺史楊暕剋交趾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sup>2</sup>

真正对南朝石刻的研究，肇始于宋代金石学家对石刻拓片的著录和解读。像欧阳修就在《集古录》的跋尾记录了题为《宋文帝神道碑》（案：此处系欧阳修误认，后经考证为梁太祖文帝神道碑）的一段文字。而《宝刻丛编》也大量辑录了王厚之《复斋碑录》中的相关记载。一直到清代，这期间主要都是金石学家在研究南朝石刻。而这其中清代的莫友芝是集大成者。莫友芝跳出了以往金石学家只以石刻拓本为据立论的研究传统，注重实地勘察，避免了以讹传讹。<sup>3</sup>莫友芝在《金石笔识》中一共确定了八处南朝石刻。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同治八年（公元1870年），莫友芝亲赴丹阳考察，找到了神道柱上缺失的部分，确定了这处陵墓是萧顺之的修陵。<sup>4</sup>清代之前的研究者以文人为主，后世多称其为金石学家。所谓的金石学主要是以文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拓本的研究，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这样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石刻碑文的拓录以及内容释义，为之后的研究者铺垫了基础。但金石学单纯的文字研究，因为材料单一，讹误较多，并没有成为之后学术研究的主流。

随着清末海外学术思想的涌入，南朝石刻的研究方法开始转向。清末民国初年张璜的《梁代陵墓考》可视为这种学术转向的代表之作。<sup>5</sup>在此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就列出了参考书籍，在对梁代陵墓的考证研究之后，作者还附上可《梁代疆域图》、《萧氏家谱》以及各种考察测量图片36幅。这是前人研究所不具备的，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在接近考古学了。而之后民国时期的朱希祖父子对南朝石刻的调查研究更加严谨，更加科学。朱希祖父子的调查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开始，一共进行了十四次。朱氏父子的调查成果主要集中在之后出版的三部著作中，分别是《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金陵古迹图考》。朱偁在《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自序中写到：

吾国六朝以前建筑，毁弃殆尽，惟陵墓、石兽、华表、碑碣，硕果仅存。非特为吾国之宝藏，亦且为世界文化史上之瑰宝。……然则吾人对于先民伟大之遗迹，吾国艺术史上之仅存硕果，又岂可任其风雨飘零，霜雪剥蚀，而同归与湮没耶？<sup>6</sup>

朱偁区别于前人只关注历史价值的研究，开始关注将陵墓石刻作为雕塑的艺术价值。而梁思成先生更是直接将南朝石刻作为六朝雕塑艺术的典范将其写进了《中国古代雕塑史》。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参与了朱氏父子考察中的四次。开启了官方关注和保护南朝石刻的滥觞。滕固作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撰写了《六朝陵墓石迹述略》一文。<sup>7</sup>毕业于上海美专的滕固，是国内较早获得美术史博士学位的学者。在文章中，他开创性地将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学和类型学运用到对陵墓石刻的研究中，考证了石刻和神道柱的源流。

建国之后关于南朝石刻的研究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其中之一就是考古学上的研究。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丹阳建山、胡桥地区以及南京栖霞地区一大批南朝齐梁时期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很多考古学者从考古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了南朝石刻及墓葬。这类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罗宗真在《六朝考古》一书中专门辟一章论证陵墓与石刻。通过对出土器物的研究，对石刻对应的墓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近出版的韦正的《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不仅对六朝墓葬的出土的材料进行了科学的归纳与总结，还增加了近年来考古界对六朝墓葬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的研究就是美术史学者的研究，大家不仅关注地表的陵墓石刻的艺术价值，也在积极探讨墓葬中出土的砖印壁画。这类的代表人物是林树中和曾布川宽。林树中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南朝墓葬，对南朝石刻和砖印壁画的研究颇有建树。在其主编的《海外藏中国文物》中，详细介绍和海外博物馆藏的陵墓石刻。而其指导的沈琨的博士论文《南朝陵墓石刻造型风格研究》对南朝石刻的风格来源和变化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曾布川宽的《六朝帝陵》通过对南朝石刻形式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曾氏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一些传统上对墓主和年代的共识被曾氏推翻。在美术史的研究中，还有很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南朝石刻的源流。林梅村和李零是这方面的代表。林、李将整个中国现存的有翼神兽进行了梳理，认为有翼神兽是中西文化传播的线索。有翼神兽很可能是“格里芬”通过草原之路传入中国的。<sup>8</sup>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对南朝石刻的研究古已有之。主要的研究途径不外乎三个方面：金石学家的金石学，考古学家的考古学，美术史家的风格类型研究。但是当研究进行到一个瓶颈时候，我们就需要停下回顾学术史，反思研究方法。

尤其受到传统美术史研究观念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对绘画的研究上。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对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研究，美术史家主要研究的是其绘画的艺术特色，风格流派和作者的归属等问题，而且这一研究卓有成效。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地下的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还是地表的陵墓石刻，在制作和被使用时，其内部和外部种种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都不是以艺术的名义展开的。他们不是艺术活动的产物，而是丧葬礼仪的组成部分。而对于风格的讨论，就很容易局限于技法等问题，忽略其背后的思想与观念。

对材料属性的认定，决定了研究者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和所采用的方法。墓葬绝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躯壳，而是建筑、绘画、雕塑、器物、甚至铭文等多种艺术和视觉的综合体。我们可以将墓葬看作是生死观物化的形态之一。与之对应是丧葬观念（非物质实体），两者共同构成了五礼之中的凶礼。这方面，巫鸿和郑岩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研究可能性。那就是将其放在一个整体的丧葬观念中去研究。所以题目中使用了“地表遗迹”的概念，就是为了区别传统主要对地表神兽的研究。对于神兽名称的考订，前人已经有了很



好的成果，故而本文在此不再谈天禄，麒麟的名称问题，文中一律用神兽代替。在“地表遗迹”的概念中，地表遗迹不仅包括神兽，神道柱，石碑，还包括建筑遗迹等。本文试图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将地表遗迹作为整个地上陵园的一部分，还原当时的丧葬情况。然后结合地下的情况，将墓葬作为一个丧葬整体研究葬仪与葬俗。从而将美术史放在一个大的文化史的环境中。

## 第一章 南朝齐梁帝陵地表遗迹概况

南朝齐梁时期地表遗存有迹可循的帝陵都集中在丹阳地区。齐代帝陵的地表遗迹主要是石刻神兽，梁代帝陵的地表遗迹较多，除了石刻神兽还有神道柱等。

### 第一节 南朝齐梁帝陵的墓主确定问题

关于南朝齐梁墓葬墓主的确定学术上有很多说法，只有确定了其墓主才能更好的对地表遗迹进行断代。下面我们按照南朝齐代和梁代帝王的顺序梳理：

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建元元年追尊皇考曰宣皇帝，陵曰永安。<sup>9</sup>陵在县北三十里尚德乡。<sup>10</sup>朱希祖在《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将丹阳胡桥狮子湾的一处墓葬认定为永安陵。之后的罗宗真、林树中、梁白泉都认可朱氏的观点，将狮子湾的墓葬及地表石刻的主人定为齐宣帝。

齐高帝萧道成泰安陵。建元四年三月壬午，皇帝崩于临光殿，年五十六。群臣上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四月丙午，葬于武进泰安陵。<sup>11</sup>陵在县北三十里。<sup>12</sup>与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相同的是朱希祖及后世学者都一致认为胡桥赵家湾的墓葬主人是齐高帝泰安陵。

赵家湾墓葬和狮子湾墓葬都属于胡桥。实地考察可知两地相去不远，只有百步之遥。所以《乾隆丹阳县志》的记载都是县北三十里。曾布川宽根据朱希祖拍摄的照片（图1）以及南朝“尚右”的风气提出了与前世学者完全相反的看法，即：狮子湾的墓主是齐高帝萧道成，赵家湾的墓主齐宣帝萧承之。但是不管怎么来看，可以确定的是狮子湾和赵家湾都是南朝齐代早期的帝陵，两者的墓主间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在叙述中采用曾布川宽的观点。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上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群臣上谥曰武皇帝，庙号世祖，葬景安陵。<sup>13</sup>对于武帝景安陵的位置，无论是早期的县志亦或是后期的学者都确定它在丹阳城东三十一里的前艾庙。

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在县东北三十六里仙鹤坳。<sup>14</sup>与齐武帝萧赜景安陵一样，修安陵的墓主和位置也没有任何疑议。曾布川宽和朱希祖以及罗宗真的看法完全一致。

齐明帝兴安陵在县志的记载中是县东北二十四里尚德村。关于兴安陵的位置是争议最大的。朱希祖、罗宗真、林树中都将现今三城巷四处并列墓葬最南面的一处（也就是曾布川宽说的三城巷（1））确定为齐明帝萧鸾兴安陵。曾布川宽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位于仙鹤坳东南2.4公里的金家村也是兴安陵。朱希祖的六朝陵墓报告中并没有提到金家村的南朝石刻。之后的罗宗真、林树中在文章中提到了金家村南朝石刻，但是他们并没有确定其墓主，只是称其为金陈王村失名陵墓石刻。笔者在此同意曾布川宽的说法。三城巷（1）石刻的风格是明显与前艾庙，仙鹤坳石刻一致的。南齐石刻与



图1 南齐齐宣帝萧承之神道左侧神兽  
江苏丹阳赵家湾 摘自《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



图2 南齐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2011年10月



图3 南梁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2011年10月



图4 齐代齐明帝兴安陵石刻神兽与三城巷（1）石刻神兽对比  
王贵阳摄于2011年11月





图5 新发现的三城巷(5)石刻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2011年11月

梁代石刻最大的区别就是南齐石刻体形呈明显的“S”型(见图2)。而梁代石刻更为粗壮,纹饰更为繁复(见图3)。<sup>15</sup>

另一处墓葬也是朱希祖没有提到的,这就是位于丹阳城东北15里的吴家村墓葬。尽管这处墓葬并没有地表遗迹可循,但是其依然有很重要的意义。吴家村墓葬发掘于1980年,甬道有两道石门,墓室中有砖拼镶嵌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史料记载:巴陵王殂于姑熟,追谥为齐和帝,终礼一依故事。<sup>16</sup>由此可以推测,吴家村是一处南齐帝陵。罗宗真和曾布川宽认为这处墓葬应该是齐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

经山地区除了以上几处南齐帝陵,还有两处墓葬有地表遗迹留存。

这就是烂石垅和水经山山村的两处失名石刻。这两处石刻在造型和风格上和其他几处帝陵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在下一部分详细描述。学者将烂石垅和水经山村两处墓葬的墓主推断为郁林王和海陵王。

南朝梁代帝陵都集中在丹阳城东二十三里的三城巷地区。在这里沿着河道依次分布着四处陵墓石刻。我们习惯按照曾布川宽的方式将其由南到北记录为三城巷(1)、(2)、(3)、(4)石刻。学界对于三城巷(2)、(3)、(4)石刻的墓主尚无疑议。认为其墓主分别是梁文帝萧顺之,梁武帝萧衍和梁简文帝萧纲。而三城巷(1)石刻的墓主则众说纷纭。前文谈到,朱氏父子、罗宗真以及林树中都认定其墓主是齐明帝萧鸾。但是,三城巷(1)石刻的神兽风格完全区别与其他南朝齐代神兽(图4)。而且梁代陵区中嵌入一处前朝墓葬也不合礼制。与梁代神兽对比,我们可以确定三城巷(1)石刻的制造年代一定是在梁代。<sup>17</sup>那么既然三城巷(1)石刻是梁代的,那么其墓主又是谁呢?曾布川宽和卢海鸣认为墓主是梁朝末代皇帝敬帝萧方智。不过,这种说法有两处缺陷。其一:三城巷(2)、(3)、(4)石刻是按照长幼尊卑排列的,符合南朝“以右为尊”的风尚。如果位于最南面的三城巷(1)石刻的墓主是萧方智,就打乱了这种顺序。其二:三城巷(1)石刻神兽风格大气,雕凿工艺极高。残存的神兽体围2.78米,比梁武帝修陵的石刻神兽的体围还多0.38米。

这也与梁敬帝末代皇帝的地位不符。于是,王志高提出另一种观点,那就是三城巷(1)这处墓葬是梁武帝萧衍在其位时期修给自己祖父萧道赐的。<sup>18</sup>值得注意的是,学界都认为三城巷地区只有三城巷(1)、(2)、(3)、(4)四处石刻。国家1988年也只将这四处神道石刻定位国家文保。但是,笔者多次在三城巷地区考察,发现了一处并没有得到重视的陵墓地表遗迹。在之前的文献资料中并没有这处遗迹的记载。这处遗迹位于三城巷(1)、(2)、(3)、(4)石刻的后方百米之遥。介于三城巷(2)、(3)之间。我姑且在此将其定名为三城巷(5)石刻(图5)。三城巷(5)石刻与三城巷(2)、(3)呈不规则的“品”字型分布。三城巷(5)石刻的神兽与之前烂石垅和水经山山村的两处失名石刻的神兽风格颇为相似,体量相当。而烂石垅和水晶山山村的两处失名石刻的墓主是曾经为帝,后被废黜为王的郁林王和海陵王。于是,笔者在此大胆的将三城巷(5)的墓主推断为原位敬帝后禅让陈霸先被分为江阴王的萧方智。这样以来,梁代除了被西魏杀死的梁元帝萧绎其他皇帝的墓葬都在三城巷地区得到了确认。<sup>19</sup>



图6 南齐高帝萧道成陵墓东侧神兽  
江苏丹阳狮子湾 王贵阳摄于2011年10月



图7 南齐高帝萧道成陵墓东侧神兽  
江苏丹阳狮子湾 王贵阳摄于2011年11月

## 第二节 现存南齐帝陵的地表遗迹情况

丹阳狮子湾地表遗迹现存神兽两件。东侧神兽保存较为完整,头部只有一角,为公兽(图6)。西侧神兽前胸以上部分被毁,为母兽(图7)。母兽的破坏在清朝末年,“据土人言,距今五十年前,有乡妇行经其地,忽为风卷入空中,乡民迷信,以为石麒麟作祟,遂纠众毁之,以致丛残不全。”<sup>20</sup>



图8 南齐齐帝景安陵东侧神兽  
江苏丹阳前艾 王贵阳摄于2011年11月



图9 南齐武帝景安陵西侧神兽  
江苏丹阳前艾 王贵阳摄于2011年11月



图10 南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墓神兽  
江苏丹阳仙鹤坳 王贵阳摄于2011年11月



图二 南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金山村 王贵阳摄于2011年二月

赵家湾石刻在朱氏父子在调查时，尚存神兽两件。“由萧承之永安陵而西，逾冈陇可百步，地名赵家湾，有已毁之石麒麟二，一已失其首，腰身中断；其他一兽，亦从残不全，惟首尚在，半埋丛芜中。”<sup>21</sup> 此处石刻在1968年被毁，当时调查拍摄的图片可供我们参考。

前艾庙齐武帝萧景安陵现存神兽两件，均为公兽。东侧神兽一角（图8），保存较为完整，西侧神兽风化严重（图9）。

丹阳东北三十六里仙鹤坳的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此处墓葬在1965年11月发掘，墓室有砖画。



图12 南齐明帝兴安陵地表石刻全景  
江苏丹阳金家村 王贵阳摄于2011年11月



图14 烂石垅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烂石垅 王贵阳摄于2011年10月



图16 水经山西侧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水经山 王贵阳摄于2011年11月

陵前石兽二，保存完好，东侧神兽单角，西侧双角，均为公兽（图10）。此处墓葬对于南齐墓室与地表遗迹的关系的理清有重要意义。墓室位于水经山南的仙圻湾，在一座俗名仙鹤坳的山岗中部，海拔75米。墓室南为一片山冲平地，

距墓510米处是一对神兽。<sup>22</sup>

金家村石刻现存神兽两件。东侧神兽一角，西侧两角，均为公兽（图11）。金家村墓葬也在1968年得到发掘。以仙鹤坳的墓葬一样，金家村墓葬的情况可以为我们之后南齐陵区复原提供范例。建山金家村现存面积大致与胡桥吴家村相同，它背靠大山头，东为秃头山，西为西山，相距约80米。墓前600米处也有一个水塘，东西长30、南北宽20米。此外，在水塘前200米的地方还有一对神兽（图12）。<sup>23</sup>

烂石垅石刻现存神兽两件。一件已经被砸碎，只能在泥土中看见碎片（图13）<sup>24</sup>。另一件也风化严重。这件石刻区别与其他石刻，是蹲在地面的（图14）<sup>25</sup>。

水经山石刻现存有神兽二件。南北向对列，均为公兽（图15）、（图16）。

以上就是南齐帝陵的地表遗迹主要情况。除了吴家村墓葬（齐和帝萧宝融恭安陵）没有发现地表遗迹之外，其他墓葬都要地表遗迹存在。而这里的地表遗迹主要就是神道石刻中的



图13 仅剩残件的烂石垅石刻  
江苏丹阳烂石垅 王贵阳摄于2011年10月



图15 水经山东侧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水经山 王贵阳摄于2011年11月



图17 南梁萧道昭陵墓南侧神兽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2012年3月



图 18 南梁萧道赐陵墓刻北侧神兽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 2012 年 3 月



图 19 梁文帝萧顺之神道石刻神兽与神道柱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 2012 年 3 月



图 20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龟趺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 2012 年 3 月



图 21 反书“太祖文皇帝至神道”神道柱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 2012 年 3 月



图 23 梁简文帝庄陵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 2012 年 3 月



图 25 陵口西侧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陵口镇 王贵阳摄于 2012 年 5 月



图 22 南梁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 2012 年 3 月



图 24 梁敬帝萧方智陵墓出土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三城巷 王贵阳摄于 2011 年 11 月



图 26 陵口东侧石刻神兽  
江苏丹阳陵口镇 王贵阳摄于 2012 年 5 月



图 27 从陵口看萧梁河, 石刻就在河两岸  
江苏丹阳萧梁河大桥 王贵阳摄于 2012 年 5 月

神兽。就现在来看, 南齐帝陵并没有其他种类的石刻留存。但事实上, 《景定建康志》中有齐宣帝陵碑的记载。故推测, 地表遗迹除了神道神兽还应该有陵碑。

### 第三节 现存南梁帝陵的地表遗迹概况

三城巷(1)石刻(墓主萧道赐)陵前存石兽二, 南侧为双角, 公兽, 保存较为完好(图17)。北兽肢体已残, 仅剩前胸一块(图18)。

三城巷(2)石刻(墓主萧顺之)在三城巷(1)石刻以北150米。26这是梁代地表遗迹最为完整的一处帝陵——建陵。建陵现存地表遗迹有神兽(图19, 方形石础、神道柱、石龟趺座(图20)各一对。南侧神兽双角, 北侧神兽面部缺失。两件神道柱上用正、反书写有: “太祖文皇帝至神道”(图21)。石龟趺座两件, 石碑已缺。

三城巷(2)石刻以北。现存神兽一件, 保存较为完整, 双角(图22)。

三城巷(4)(墓主萧纲)石刻现存神兽一件。神兽躯干后面缺失, 头部双角(图23)。

三城巷(5)(墓主萧方智)石刻现存神道柱一对, 神兽一件。神道柱上不缺失, 只剩下瓜楞纹柱身, 而

且神道柱体量远小于建陵的神道柱。神兽无角，出土时前肢断裂，现存丹阳石刻园（图24）。

除了以上三城巷的五处梁代帝陵遗迹，丹阳还以一处梁代石刻留存。那就是位于陵口的陵口石刻。现存有石兽二，东侧神兽，双角（图25）。西侧神兽，独角（图26），两者均为公兽，各置于萧梁河两岸（图27），是所有现存南朝石刻中体量中最大的两件，可能与其功能有关，下文会展开。

第二章 南朝齐梁帝陵的陵区复原方案

前面我们梳理里南朝齐梁帝陵的墓主情况并对现今地表遗迹的情况也进行了实地调查。这章将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对南朝齐梁帝陵的的地表情况以及南齐的墓室进行复原。

第一节 南齐帝陵陵区的地表复原

“聚族而葬”的思想对齐梁帝陵的选择影响很大。因而，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看，六朝时期往往由两个以上陵墓依照一定规律构成一个庞大的陵区。南朝齐代的陵区就是以丹阳的水经山为中心。在水经山方圆几公里的地方分布着南齐7处帝陵（图28）。

从已经发掘的三处帝陵，我们可以对南齐的帝陵的地上部分进行推测。水经山是丹阳东北一处绵延很长的石质山峰。在绵长的山脉中，山脊与山脊环抱形成多处天然的半封闭空间。这也就是当地人习惯所说的山湾、山坳。我们在水经山周围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地名，像赵家湾、狮子湾、仙鹤坳等。南朝帝陵的选择并不是一定要朝南的，但一定是依山势而建。而这些半封闭空间就形成了天然的陵园。一个个山湾形成了每个帝陵自己相对独立的陵园，各个帝陵之间有山坳相隔。以赵家湾帝陵和狮子湾两处帝陵为例。尽管两者相距百米之遥，但是，由萧承之永安陵（狮子湾）而西，“逾冈陇百步”<sup>27</sup>之后才能到达赵家湾（图29）。已经发掘的三处帝陵都证实了这种情况。三面环山的陵园的空出的那一面缺口就是陵园的入口。而陵园如后对面的小山往往是这个山湾中的最高处，算是这处山湾的主峰，皇帝的墓室就在这个主峰的中间位置。一般情况下，从陵园入口处到墓室所在的主峰大概有500米到1000米不等，这完全取决于构成陵园这处的山湾的大小。



图 28 以水经山为中心的整个南齐帝陵区情况 数据来自 goo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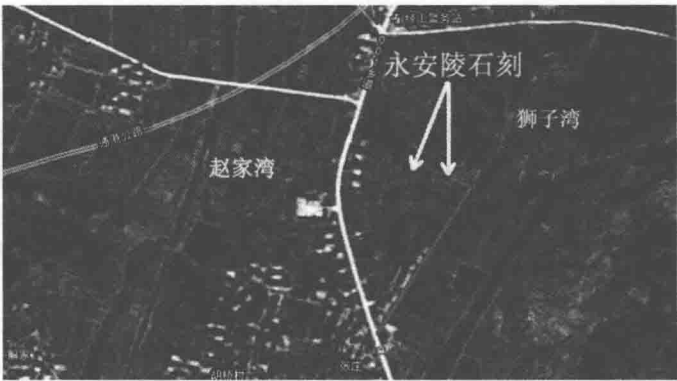


图 29 赵家湾与狮子湾帝陵关系 数据来自 google ea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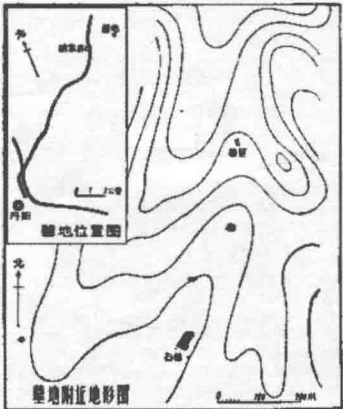


图 30 仙鹤坳大墓地形图  
摘自《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

下面就以仙鹤坳的帝陵为例，展开分析。从考古报告的地形图来看（图30），28等高线从下到上依次增高。我们可以发现，墓室所在的等高线是向上凸起的，这就说明这里是这个山湾的最高点。在墓室左右两侧是向下突起的等高线，说明这里是两处山脊，而正是这两处山脊环抱处了这处帝陵。地形图下面等高线敞开的部分就是陵区入口。而陵园入口到主峰之间就是神道，既然山湾是天然形成的，那么陵园的入口就不一定是正对着主峰的，故而神道不一定是笔直的。在图中，我们发现从陵园到主峰就是一段曲线。也许在这里用“曲径通幽”来形容有些不妥，但是从进入陵区到主峰，就是这种逐渐深入的感觉。我们知道古代墓葬在营造时有“藏”的思想，而这样的陵园构成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陵园中最重要的墓室，一定藏在山湾的最深处。不仅是最深处，而且还是最高处，这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匹配。试



想，皇帝在建康驾崩。臣子们将其灵柩运送回皇帝的故乡。送葬的队伍从陵园入口进入，抬着皇帝的尸体一步步走向陵园的最深处，就像走向另一个未知的世界。神道地势逐渐抬升，皇帝的肉体 and 灵魂也跟着上升，皇帝本来就是天子，是沟通上天与地下的权威。在这个天地相接的最高处，皇帝将到达彼岸，继续荫护他的子孙臣民。

我们常见的神道石刻中的神兽就是用在山湾缺口处的，也就是陵园入口处。他们一左一右拱卫在陵园入口处。在多次实地考察中，笔者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南齐的神道石兽的颈部以上并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向一侧偏过去的，就好像转过去在注视着什么。两侧的石兽转过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图31）。通过对墓葬关系的分析，我们知道这是制造时有意为之的，神道石兽偏过去注视的方向就是陵园的入口处。首先，这种现象就是与神道石兽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在前人的研究中，大家认为这些神道石兽叫做“辟邪”、“天禄”、“麒麟”等都是用来镇守陵园的，有“辟恶驱邪”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陵园三面皆山，任何想进入陵园的人都要从这里在两件高大雄壮的神兽的注视之下通过。如果你是白天来拜陵的臣子王孙，一定会被这里庄重肃穆的氛围感染，对死者更加敬畏。如果你是夜里来盗陵的不速之客，在这里看到两件的威猛神兽直直的盯着你，恐怕心里一阵惊慌，要打退堂鼓了（图32）。其次，神兽偏向一方的情况是与陵园的构成有关的。因为南齐这种半封闭式相对独立的陵园使得陵园入口只有唯一的一处。而到了梁代，陵区里的各个帝陵之间的独立性并不是特别强。而陵门也不止一个，神兽的这种偏向也就失去了意义。故而，梁代的神兽是没有明显的偏向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墓室是水塘的关系。现在发现的南齐帝陵都有水塘发现。水塘可能在帝陵营建的时候就被规划其中了，这也得到考古学上的证实。从技术上来讲，南方土壤潮湿，丹阳地区尤其多雨。加之南齐帝陵都选址在三面环山的半开放空间中，大雨之后，山上的雨水很容易侵入墓室，严重时甚至会聚集在陵园之中。水塘的规划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在主峰的墓室中修有阴井，雨水可以漏下阴井从墓道下面的排水道排出。在发掘的南齐帝陵中，这种排水道十分常见，长短不一，终点都是陵园前面的水塘。<sup>29</sup>技术之外，当时的丧葬观念也是这种水塘出现的原因，这部分笔者会在下一部分详细阐释。

现存的南齐帝陵的地表遗迹主要就是神道石兽，前文已有详述。尽管文献中还有陵碑的记载，但是并没有实物留存。神道柱在南齐帝陵也没有发现，而且学界对于南齐帝陵是否存在这种神道石刻亦没有确切的答案。故而本文在对南齐帝陵的复原过程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

## 第二节 南梁帝陵陵区的地表复原

南梁帝陵主要集中在三城巷地区，这里集中了梁代五处帝陵的地表遗迹。在这个陵区里，各个帝王的陵园依照礼制排列其中（图33）。按生前尊卑地位有规律分布，一般以长者尊者居右为主。那么整个南梁的陵区有面积是什么情况呢？《梁书·武帝纪》载天监七年（公元526）六月“复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内居民，改陵监为令”。这算是对梁代陵区面积比较直接的记载。这是对于整个三城巷最核心的具体陵区而言的。其实，整个大范围上的梁代陵区应该远不止这片区域，这从陵口石刻可以推断出来。陵口石刻并位于萧梁河的两岸。陆游在《入蜀记》中写道：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六月“十五日早，过吕城闸，始见独辕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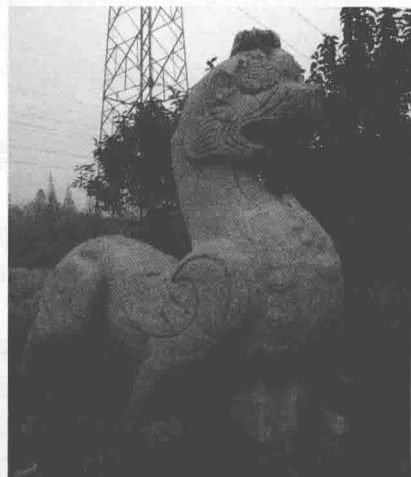


图31 齐武帝景安陵中头部转向陵园口的神道石刻  
江苏丹阳前艾 王贵阳摄于2012年5月



图32 南齐帝陵陵园地表遗迹复原图  
王贵阳手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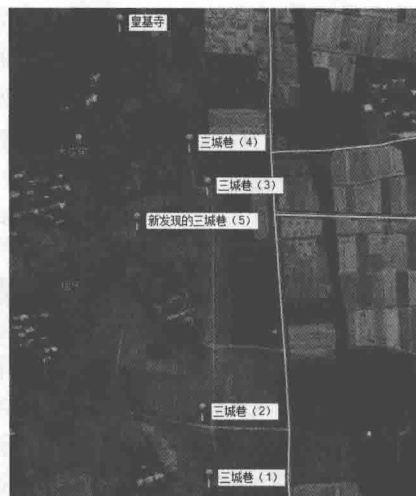


图33 南梁帝陵陵区情况 数据来自 google earth



图 34 墓葬的门式结构基础  
摘自《南京南平王萧伟墓阙发掘简报》

车。过陵口，见大石兽偃仆道傍，已残缺”。<sup>30</sup>位于河道两岸的石刻既然不属于具体任何位帝陵的地表遗迹，那么修建的功能是什么呢？南朝陈代顾野王编纂的《舆地志》为我们留下了线索：

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墟西，为齐梁二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有亭，有营户守典之。<sup>31</sup>

由此可见，陵口石刻是最为陵区标志的。这种推测也可以从石刻本身得到验证。陵口石刻是所有梁代石刻中最大的两件。正常的梁代帝陵石刻神兽一般的长度在3.3米左右，高度在2.7米左右。<sup>32</sup>

但是陵口石刻东侧神兽，身长4米，残高3.6米；西侧神兽，身长3.95米，残高2.9米。这是远远大于其他石刻体量的。位于河道两岸的陵口石刻作为陵区标志，只有庞大的体量才能让乘舟而来拜陵的臣子看到。

梁代之前的齐代是以三面环山的山湾形成的天然空间为陵园的。梁代的帝陵在布局之时并不是如此。可能是人工修成的建筑规划出了帝陵的陵园。《南史·梁武帝本纪》记载：

夏六月乙酉，龙斗于曲阿王陵，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树木倒折，开地数十丈。<sup>33</sup>

而梁代帝陵所在的三城巷也有“城”的概念，“城”的概念的出现，说明了陵园四周原来可能是存在类似城墙的布置。现在对三城巷的考古调查并没有发现城墙的遗址，王志高推测当时并不是用城墙围出陵园，可能是用竹篱笆代替，也就是“行马”。<sup>34</sup>因为年代就远，木质的“行马”早已腐朽不见。

关于梁代帝陵的地表情况，《旧唐书·礼仪志五》记载：大同年间(公元535-546)梁武帝谒拜建陵，曾对身边侍臣说：“陵阴石虎与陵俱创二百余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中道门为三阙。”梁武帝在位期间正处在梁代社会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人民生活富裕，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国库富裕。这对梁代帝陵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这段文字可见一斑，帝陵的地表石刻要求体积。这与现在三城巷(2)的地表遗迹可以相互印证。三城巷(2)也就是萧顺之修陵现存的地表遗迹就有神道碑、神道石兽、陵碑(只剩下部石龟跌座)。但是一对四件的石质基座，尚不清楚他们的功用。在上面的史料中，还提到了“二陵中道门为三阙”。这说明陵园之中是有陵门的。三城巷地区的梁代帝陵都为发掘，并没有实物可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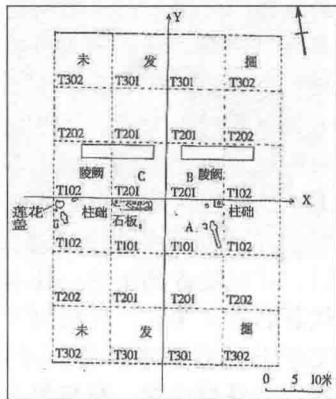


图 35 墓阙遗址与神道石刻关系图  
摘自《南京南平王萧伟墓阙发掘简报》

但是2000年在南京栖霞区发掘的梁南平王

萧伟墓葬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sup>35</sup>南平王萧伟是萧顺之的第八子，梁武帝萧衍的弟弟，活动年代主要是在梁代的鼎盛时期，也就是梁武帝在位期间。所以他的墓葬的发掘对梁代帝陵的复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这次考古发掘全面的勘察了墓葬神道石刻的埋藏情况及神道的构筑状况，发现了一座墓葬的门式结构(考古报告为了方便记录称其为墓阙建筑)。整个萧伟墓阙的基础平面呈条状，顶部平直，整体呈墙状(图34)，墙阙的前面是神道柱残件(图35)。考古工作者推断其墙厚应该在2米左右，墙体高度可能在3~3.5米之间。两阙之间宽5.67米，地面用土和破碎的砖、瓦片搅拌后筑成，较为坚硬，在西阙东墙和东阙西墙中部相对应的位置分别有大型柱洞。柱洞直径基本相同，约为0.53米，柱洞内还残留着巨大的木柱痕迹，洞底垫有砖块，在柱洞附近的地面上清理出少量竹篾编成的席状物，这两根巨型木柱和席状编织物



图 36 萧伟墓阙复原图 摘自《文物》2003年5月，《南京梁萧伟墓阙原状研究》



图 37 南京狮子冲陵墓阙门遗址  
江苏南京栖霞山狮子冲 王贵阳摄于2013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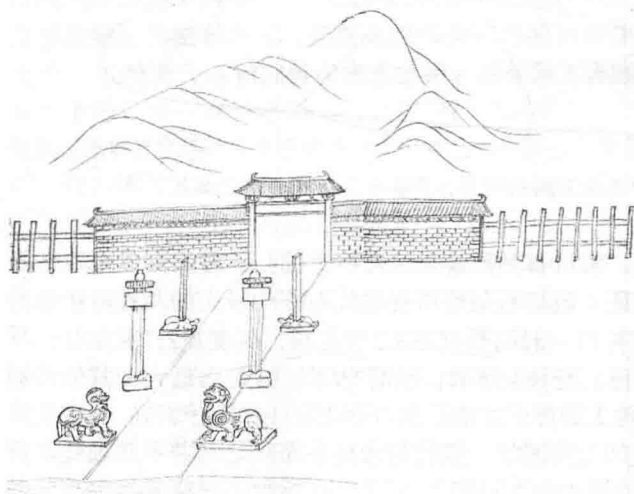


图 38 梁代帝陵地表情况复原图 王贵阳手绘

问题。那就是距三城巷梁代帝陵核心区域仅1.6公里之遥的一处寺庙遗迹，这就是皇基寺。皇基寺始建于梁大同年间(公元535年—545年)。该寺初名皇基寺，唐代为避玄宗李隆基的名讳，改名皇业寺，元代称戒珠院，明宣德年间重建，复名皇业寺。皇基寺与梁代帝陵的关系极为密切，很多关于南朝帝陵的描述中都谈到皇基寺。《乾隆丹阳县志》就记载到：“修陵，在县东二十五里皇业寺前”。<sup>39</sup>这种密切的关系并不是偶然，试想，统治者怎么会允许外人擅自将寺庙建在规划严谨的皇家帝陵的核心区域？关于修建皇基寺的目的，最直接的文献来自《资治通鉴》，其中卷第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记载到：“大同二年，上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诬弘氏为劫……没其材以为寺。”<sup>40</sup>由此可见，皇基寺的修建是梁武帝为自己的父亲萧顺之祈求冥福而修建的。

关于皇业寺与陵区的关系，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材料。《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二古迹下，列有一条目：“建陵寺刹下铭，任孝恭撰。”<sup>41</sup>任孝恭是梁代著名的文学家。《梁书》卷五十的列传第四十四文学下，有任孝恭传。《任孝恭传》也有相关内容：“外祖丘它，与高祖有旧，高祖闻其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初为奉朝请，进直寿光省，为司文侍郎，俄兼中书通事舍人。敕遣制《建陵寺刹下铭》，又启撰高祖集序文，并富丽，自是专掌公家笔翰。”<sup>42</sup>两条文献都提到任孝恭为建陵寺写刹下铭。建陵在三城巷自不必说，但是，查遍整个与之有关的文献，都没找到丹阳地区叫建陵寺的寺庙。事实上，建陵周围只有皇基寺一座寺庙。联想《太平广记》中“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建寺”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皇基寺就是所谓建陵寺。元代《至顺镇江志》卷二十一杂录下中就记载了一篇题名为《沈碑萧塘》的文章，其文写到：“丹阳戒珠院，即梁武帝所幸皇基寺也。寺有梁碑岿然。往来官客摹打纷纷。寺僧厌之，沉之于塘头西村、萧塘桥之南数百步水中。”<sup>43</sup>被众人纷纷摹拓的石碑很可能就是任孝恭《建陵寺刹下铭》。由此我们更能确定皇业寺就是建陵寺。而建陵寺其实从属于建陵的，也就是说皇基寺是整个梁代陵区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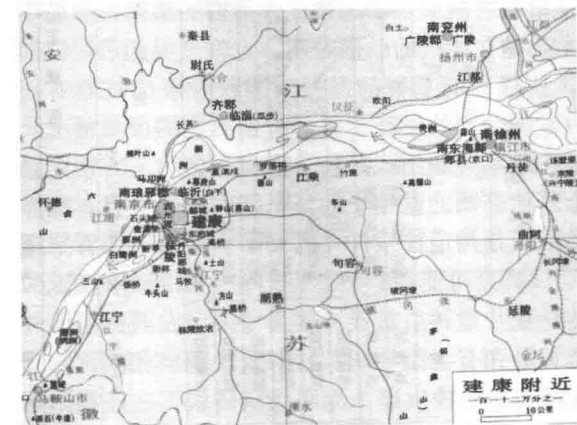


图 40 从建陵到丹阳的拜陵路线图 摘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

可能与阙门有关，阙门也就是我们推测的陵门(图36)。萧伟墓的这种门式结构并不是孤立的，现在南京栖霞狮子冲发掘的墓葬亦给我提供了材料。这处墓葬的墓主被认为是陈文帝陈蒨<sup>36</sup>或者是梁武帝儿子昭明太子萧统<sup>37</sup>。这处墓葬尚未发掘完毕，但是也发现了和萧伟墓类似的墙阙陵门建筑(图37)<sup>38</sup>。综合两处墓葬的发掘情况，我们可以推论阙墙一左一右置于神道两侧，中间部分就是神道上的陵门。而陵门建筑与其他常见的神兽、神道柱的关系是：先是神兽，神兽之后是神道柱，之后是陵碑，最后是这种陵门建筑。关于前面文献记载的“道门为三阙”则可能与礼制有关，帝陵或许因为等级较高所以陵门为“三阙”。

我们现在还原了一个帝陵的陵园情况(图38)。就整个陵区而言，还有一处值得考虑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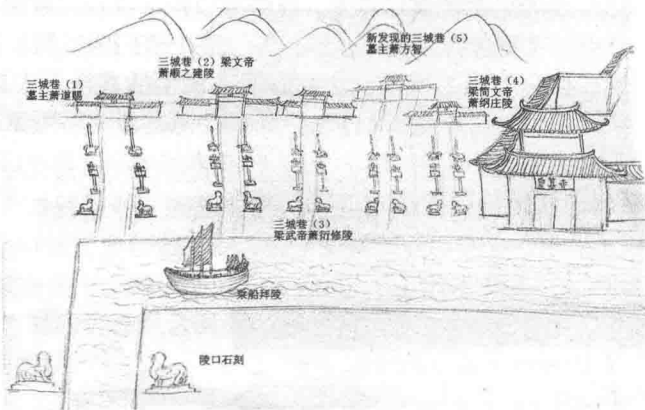


图 39 整个梁代陵区布局与拜陵示意图 王贵阳手绘

我们现在还原了一个帝陵的陵园情况(图38)。就整个陵区而言，还有一处值得考虑的问题。那就是距三城巷梁代帝陵核心区域仅1.6公里之遥的一处寺庙遗迹，这就是皇基寺。皇基寺始建于梁大同年间(公元535年—545年)。该寺初名皇基寺，唐代为避玄宗李隆基的名讳，改名皇业寺，元代称戒珠院，明宣德年间重建，复名皇业寺。皇基寺与梁代帝陵的关系极为密切，很多关于南朝帝陵的描述中都谈到皇基寺。《乾隆丹阳县志》就记载到：“修陵，在县东二十五里皇业寺前”。<sup>39</sup>这种密切的关系并不是偶然，试想，统治者怎么会允许外人擅自将寺庙建在规划严谨的皇家帝陵的核心区域？关于修建皇基寺的目的，最直接的文献来自《资治通鉴》，其中卷第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记载到：“大同二年，上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诬弘氏为劫……没其材以为寺。”<sup>40</sup>由此可见，皇基寺的修建是梁武帝为自己的父亲萧顺之祈求冥福而修建的。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对梁代帝陵的地表情

况予以复原。在布局上,从陵口石刻开始,就算进到了梁代陵区了,而陵区最核心的位置是三城巷区域。在这里,各处帝陵的陵园按照礼制聚集在整个陵区。陵区环境一定是肃穆庄严的,为了营造这种氛围,整个陵区种满了树木。《陈书》就记载了太建三年(公元571),淳于量“坐就江阴王萧季卿买梁陵中树。季卿坐免,量免侍中。”<sup>44</sup> 陵区中的各个陵园以“行马”围出“城”,陵园的最前面是水道,之后是神道石刻的组合,长长的神道的尽头是墓室所在的山丘。

除了对整个梁代陵区地表遗迹的复原之外,我觉得对梁代臣子王族的拜陵路线的复原也是颇有意义的,这可以便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梁代的丧葬情况。《舆地志》记载:“四时,公卿行陵,乘舫艫,自方山由此入兰陵,升安车,輶传驿置,以致陵所。”<sup>45</sup>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梁代时,王子公卿出发谒陵,自都城建康秦淮河到达城南,从方山沿破渎岗东下,过二十四埭,进入萧梁河。以河两岸的陵口石刻为标志进入陵区,最后到达泊船的水港之后换车进入陵区皇基寺,沐浴斋戒之后前去拜陵(图39)、(图40)。

### 第三节 南齐帝陵墓室结构的复原

墓葬是一个整体,由地上建筑和地下的墓室构成。复原帝陵的墓室,对于我们了解南朝齐代帝王的丧葬情况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梁代帝陵尚未发掘,这还有助于我们推断梁代帝陵的墓室情况。

墓室除石门,主要是用青砖砌建而成。平面呈凸字形,前为甬道,后为主室。以内壁计算,一般帝陵墓室全长13米左右,甬道内有两重石门。<sup>46</sup> 两重石门是帝陵等级的象征。从现在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王侯一级的墓葬整个墓长8米左右,只能配一重石门。<sup>47</sup> 墓室和甬道均以席纹砖铺地。墓室和甬道的两壁,在没有壁画的地方都用花纹砖砌成。附属结构有排水沟和挡土墙;排水沟墓内部分铺在墓室底砖的中间。砌成方形,沿墓壁四周及墓室中部铺设,前后有阴井口(图41)。

壁画:第一重石门前,即甬道口与第一重石门之间的左右两壁,有砖文自铭为“狮子”的砖印壁画,狮子作蹲伏状,张口吐舌,竖耳,尾上翘。清理时发现上涂彩色,两耳、两限、鼻、舌、发均涂红色,两颊涂白色。《武士》位于第一重与第二重石门之间的两壁(图42)。武士头戴皮弁(或弁冕)。身著袴褶,外罩箭袖铠,足著靴,双手握剑,垂于腹下。主室两壁前方上部是《羽人戏龙》、《羽人戏虎》图。《羽人戏龙》(图43)、《羽人戏虎》(图44)。图上面是“天人”的形象。整个画面四周都散刻莲瓣,花草,卷云等装饰。《竹林七贤及荣启期》位于主室后壁上方,两壁对称,每壁各半幅作四人。《车马出行》左右对称。位于《羽人戏龙》和《羽人戏虎》以及《竹林七贤》两幅画面下,由《骑马武士》、《持戟武士》、《执扇盖侍从》、《骑马乐队》(图45)四组单独画面构成一个整体。壁画的使用也被认为与等级有关,只有帝王才能使用《竹林七贤及荣启期》这样的壁画。<sup>48</sup>

南齐帝陵破坏严重,随葬器物出土较少。石器类主要有:石祭台,石槽等。陶器类:有陶俑、陶犀牛,陶屋、陶猪圈、陶耳杯、陶盘、陶罐,陶座等。瓷器类:有青瓷碗、青瓷钵、青瓷鸡首壶等器皿等。此外,墓中还有钱币,金器残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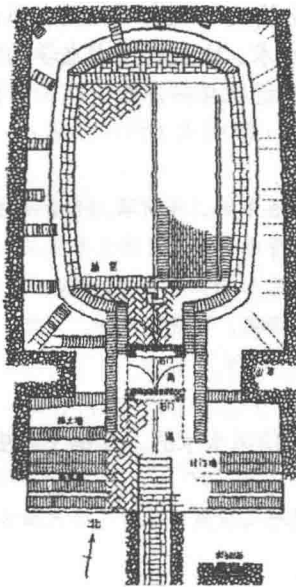


图41 南齐帝陵墓室结构  
摘自《丹阳胡桥、建山两座墓葬》



图42 南朝壁画中的《武士》形象  
南京博物院藏 王贵阳摄于2010年5月



图43 南朝壁画中的《人物戏龙》形象  
南京博物院藏 王贵阳摄于2010年5月



图44 南朝壁画中的《人物戏虎》形象  
南京博物院藏 王贵阳摄于2010年5月



图45 南朝壁画中的《骑马乐队》形象  
南京博物院藏 王贵阳摄于2010年5月

### 第三章 南朝齐梁帝陵的丧葬观念

前文对南朝齐梁帝陵的陵区地表进行了复原，但这是实物范畴，帝陵园的营建一定是在一定丧葬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 第一节 南朝齐梁帝陵的营建与风水问题

丧葬风水观念的出现及其吉凶推演体系的确立，是汉魏六朝时期风水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丧葬风水观念具体来看，体现在墓法之上。风水墓法尽管体系驳杂，但就其实质而言，无非有三个基本吉凶推演模式：那就是所谓的“形”、“理”与“日”。所谓的“形”就是以墓地所处的山水形势来占断吉凶，所谓的“理”就是墓地营建术中的具体定向之法，“日”当然就是指时日禁忌。汉魏六朝时期的墓法体系也是如此，它也同样有形势、方位和时日的讲求。

在选择葬地时，中国人十分讲究“风水”。风水即古代“堪舆”之术。帝陵在营建时更是比较讲究。不仅如此，萧氏家族不仅相信风水术，而且有风水之学的家学传统。这肯定对帝陵的营建产生的重要的影响。关于萧氏家族相信风水术的历史记载甚多，如梁武帝萧衍与昭明太子萧统械在萧统母丁贵嫔墓地选择上就因风水问题而产生猜忌，据《南史·昭明太子统传》载：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地者因阍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官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禱。”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sup>49</sup>

可见萧衍和萧统都是非常相信风水术的。又据《南史·杜嶷传》载：

嶷位西荆州刺史，时讖言“独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会嶷改葬父祖，帝敕图墓者恶为之，逾年而嶷卒。<sup>50</sup>

不仅如此《南史》还有关于梁元帝学习相术的记载：

初從割景受相術，因訊以年。<sup>51</sup>

无疑，梁元帝本人也是相信风水术的。萧氏家族不仅信仰风水术，而且颇精通风水之学。梁武帝萧衍本人“阴阳纬候，卜筮占诀，并悉称善”。<sup>52</sup>而著有《宅经》、《葬经》的萧吉，系梁武帝萧衍兄长沙武王萧懿之孙，史载其“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sup>53</sup>可见，萧吉的风水之学有其家学传统。

在葬地选择中讲求形势是丧葬风水术的基本吉凶原则。这一吉凶推演模式在丧葬风水术的早期就已经确立。在这方面，“行营高敞地”的墓地选择原则，影响相当广泛。这一原则，在《葬书》中也有所反映，《葬书》称：“土高水深，郁草茂林。贵如千乘，富如万金。”<sup>54</sup>

“行营高敞地”的葬地选择原则。可以让我们一窥南朝时期丧葬风水墓法之一斑。现在发现的南朝齐梁都符合“行营高敞地”、“土高水深，郁草茂林”的原则。以南齐帝陵为例：从已发掘的仙鹤垌、金家村和吴家村帝陵来看。前文已经对其陵区的环境进行了复原，我们可以看出帝陵的墓室都在整个陵园的最高处。而且齐代帝陵前面的水塘在观念上似乎就是“风水塘”，这与《葬书》中“土高水深”相吻合。三面环山的南齐帝陵自然是“郁草茂林”。不仅南齐帝陵如此，南梁帝陵也是如此。尽管南梁帝陵尚未发掘，但是依据神道后面的垌丘和神道前面的水系，我们可以推断南梁的帝陵也是“土高水深”的。前文谈到，南梁帝陵树木茂盛。这也是严格符合墓法原则。

另一方面，汉魏六朝时期“行营高敞地”从其推演模式而言，从属于于形法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